

鱼叉与桩网之争 ——司各特的《雷德冈利托》

石梅芳

(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瓦尔特·司各特的《雷德冈利托》以“捕鱼站暴乱”为源头, 表面上记录了一段“可能发生”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事件, 其隐藏的真正线索是资本主义文明取代封建庄园制、和平取代暴力的过程。分离主义在苏格兰彻底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以约书亚·格迪斯为代表的商人和农业改革家, 既是亚当·斯密笔下的“理想绅士”, 也是一位具有韦伯式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现代英雄。司各特以鱼叉与桩网、荒原与果园、暴徒与英雄的对比, 指出联合是使苏格兰尽快摆脱贫困和战乱的要素, 代表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则是苏格兰繁荣富足的必要保障。

关键词: 瓦尔特·司各特; 《雷德冈利托》; 联合; 资本主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1)03-0143-06

司各特的《雷德冈利托》发表于1824年, 这部小说是近年来国外司各特研究的一大热点。评论家认为司各特的真正天才之处在于威弗莱系列小说, 而《雷德冈利托》则是其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小说仍然采用了以往类似的线索——英格兰青年前往苏格兰高地游历, 却置身于詹姆士党的复辟活动。然而, 与1715年或1745年的历史事件不同, 这个以1765年左右为时代背景的故事纯粹是作者基于历史发展可能性的虚构之作。这部作品呈现出叙事角度多变、文体多样性和身份的复杂性, 评论的热点往往集中于小说的叙事与身份或历史编纂学, 却忽视了小说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

在这部小说中, 教友派商人约书亚·格迪斯冲破阻碍, 成了寻找和拯救主人公达西的英雄和“精神上”的父亲。这一角色承担着詹姆士党策划未发动便宣告流产的复辟活动之外的第二线索的重要作用。同时, 这更是一个亚当·斯密笔下的理想的士绅形象。他的父辈专心贸易, 家产丰厚。而他却退出各大贸易公司的股份, 回家乡开展农牧渔业等各方面的改良和改革, 成了一位“亲手栽种自己园子的园艺家, 一身兼地主、农场主和劳动者三种资格”(此处译文参考谢祖钧等译《国富论》, 略有改动)^{[1](45)}。从表面看, 格迪斯从大部分商业公司退股, 专心经营农场似乎是历史的倒退。实际上, 这正符合亚当·斯密反对重商主义, 提倡重视农业改良的观点。苏格兰农业改良的迫切性早在启

蒙运动时期就已经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普遍注意。亚当·斯密曾严厉批评苏格兰各地因为固守传统、拒绝新式方法导致的落后局面。司各特深受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的影响, 早在大学时代就已形成了支持现代商业文明的进步思想观, 一方面赞成开展广泛、自由的商业往来, 一方面关注农业文明的发展状况。^{[2](41)}《红酋罗伯》(1818)中, 尼克·贾尔维等苏格兰商人形象所表现的民族性之外, 格迪斯对农牧渔业的改革已然代表了在和平稳定的年代苏格兰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一、鱼叉与桩网

达西怀着对自己身世的疑问, 从爱丁堡出发前往苏格兰高地与英格兰边境地区游历。面对索尔维河对面的英格兰故乡, 达西在迷茫之中差点被激流冲走, 幸被陌生的渔夫所救, 但也因此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之中。他不但亲眼见证了发生在“索尔维河地主”与贵格派的约书亚·格迪斯之间发生的鱼叉与桩网之争, 更身不由己卷入一场暴乱。一群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暴徒”手持武器, 攻击了河口的捕鱼站, 摧毁了桩网, 绑架了主人公达西。这些人的首领, 就是当日救起达西的“索尔维湖地主”。从起因看, 这场暴乱似乎纯粹是生产方式之争。

鱼叉是以“索尔维湖地主”为首的渔夫们所使用的工具,桩网则是格迪斯和英格兰潮网公司架设在英格兰与苏格兰边境的索尔维河口的捕鱼工具。在达西眼中,鱼叉这简单原始的捕鱼工具,却似乎是那些“渔夫”(即暴乱参与者)的娱乐和运动的工具。他们用鱼叉捕鱼时的矫健身姿、灵活动作与快乐情绪给达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切与索尔维河沿岸的自然风光互相映衬,造就了一种世外桃源般的效果。在达西看来,用鱼叉捕鱼真是一门男子汉的艺术,使他用网袋捞鱼的行为变得幼稚可笑。达西与法兰克(《红酋罗伯》)、爱德华(《威弗莱》)等人一样涉世未深、心怀浪漫。然而,现实并非梦境。有“索尔维湖区地主”之称的渔夫首领与被蔑称为“贵格”的教友派商人约书亚·格迪斯之间发生的言语上的冲突以及随后捕鱼站被毁、住宅遭破坏的恶劣事件表明了现实的残酷性。可见,渔夫们使用的鱼叉和格迪斯架设的桩网,绝非捕鱼工具的不同这样简单。

进入十八世纪,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开始大规模地席卷苏格兰。但是苏格兰的地理条件导致了发展的极为不均衡。一方面,格拉斯哥、阿伯丁等中部和低地由于交通便捷、土地条件较好可以提供纺织业所需的羊毛,从而逐渐发展成为大型的工商业城市。但高原地区、特别是边境山区,地理条件恶劣,且因内流河流多接近瀑布线不适合运输之用而相对闭塞。小说中的主人公达西·拉蒂默骑马在邓弗里斯地区旅行时处处涉险,足可窥其一二。索尔维河是穿越英格兰与苏格兰边境的一条河,水深湍急,以盛产肥美的鲑鱼为名。限于当时的地理状况,渔业发展成为当时此地发展经济的唯一的可能。因此,苏格兰商人格迪斯与英格兰潮网渔业公司合作,在索尔维湾的潮汐口架设了桩网,建立了捕捞站。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而采用适当的机器既方便又可以减轻原来的劳动。^{[1](16)}桩网尽管算不上复杂精细的大机器,却是大规模捕捞的必要工具。然而,这种做法引起了苏格兰人一致的反感甚至仇恨——从普通渔夫、吟游诗人、复辟者甚至律师阿兰,对此均持反对态度。这背后显然隐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

“索尔维湖地主”反对的原因有二。首先,格迪斯及其公司的捕捞方式违反了苏格兰传统,是一种非法的、不公平的行为;其次,这种捕捞方式将会彻底毁灭索尔维湖的鱼类,将下游的五十几户渔民置于危险的境地。^{[3](60)}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非常符合

生态和自然保护的原则,也极易引起读者的同情。然而,“索尔维湖地主”本身并非索尔维湖或索尔维河附近土地的拥有者,他的这种一湖之“主”的身份,只是一种自我认可。他所强调的违反传统,并非单单针对捕捞鱼类的方式而言。作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坚定支持者之一,他想要维护的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使用破败的渔船、渔网和原始的鱼叉捕鱼,也不是他赖以谋生的手段,这是几十户追随他的渔夫们的生活。他屡次扬言要摧毁捕捞站,摧毁格迪斯圈围的“猎场”的真正原因是围场和桩网捕鱼必然对渔猎“运动”带来破坏。复辟活动的组织者之一雷德冈利托更加明显地指出,“我鄙视他(格迪斯),也很讨厌那些贪婪的设施,他用那些东西毁灭了一种富有男子汉气概的运动”。^{[3](248)}雷德冈利托的立场比起“索尔维湖地主”更具有贵族的特征,他彻底忽略了底层民众的需要。在达西看来如同娱乐般的叉鱼活动,对渔夫来说是生计的需要,对于地主和贵族而言却仅仅是运动和娱乐的方式。格迪斯以新时代的商人兼农场主的立场,设立捕捞站、将敞地圈围起来的方式,影响到他们的渔猎活动,因而屡屡受到威胁。

亚当·斯密认为,“打猎和钓鱼是人类未开化社会中最重要两种职业,在进步的社会里变成了人类惬意的娱乐。昔日为生活需要而渔猎,今日则为寻欢作乐而渔猎。因而在进步社会里把别人当作消遣的事而作为自身职业的人,他们都是一些极端穷困的人。……大多是由于这些职业有天然偏爱的人才从事这种行业,而不是因为靠它们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1](76)}从达西亲眼见证的座次编排、餐具区分可见,这些聚集在低矮的农舍中的“捕鱼人”仍然被束缚于封建庄园制的等级制度之下,保持原始的捕捞习惯,从而也维持着贫困的生活。另一方面,人类征服自然的信心在启蒙运动之后大大膨胀,因此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存在暴力的、非再生型的破坏。企业主和资本家在进行原始的资本积累的同时,也极大地破坏了周边的自然环境。在索尔维河口设立的桩网,的确大大提高了捕捞率,但对那些以捕鱼为生的渔民而言,具有破坏性的一面。这种负面影响,也是司各特在作品中常常表现出左右矛盾的心理原因之一。工业文明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苏格兰的进步,另一方面对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彻底破坏也很让人痛心疾首。苏格兰民众各阶层从律师到治安法官到普通小贩同情索尔维湖“案犯”,也是出于对斯图亚特家族及其所代表的旧秩序和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即将彻底告别历史舞台的一

种怀旧的留恋。

二、荒原与果园

然而，索尔维湖地主与从事农渔的“渔民们”的落后生产方式，显然只能延续苏格兰的贫困。产业革命以来，苏格兰经济尽管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但远远无法与英格兰成熟、完善的产业模式和市场化程度相比。农牧业方面的落后状态尤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亚当·斯密认为封建残余多的地方，就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阻碍，联合之前苏格兰低地的休耕制度致使“苏格兰土地中那部分能够很好耕作的土地所生产的与其完全能够生产的相比也要低得多”。^{[1](154)}十八世纪，苏格兰的可耕地仅有三万英亩，不到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十，还有约百分之十三的质量参差不齐的可放牧的土地以及百分之三的可砍伐的森林，与此相反的是人口呈几何增长的趋势。^{[4](9)}这种现象在高地更加明显，人口伴随着贫困以更疯狂的速度增加。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专门分析过苏格兰高地的现象。他比亚当·斯密更加重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认为“一国的幸福……取决于食物增加的速度”。^{[5](58)}因此，他建议重奖农业改良者，“用财富改良土地，使农业家栽培入不敷出的土地成为生产的，在各种可能的财富用法中，也许是最有利于国家，最有利于下层阶级的”。^{[5](122)}对苏格兰发展前景的忧虑，使得苏格兰上层知识分子格外重视农业的研究。1783年，由当时著名的文人亨利·麦肯齐主持成立了爱丁堡皇家协会，主要资助和奖励在科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创新。同时农业改良的紧迫性不断获得学术性的认可，最终于1790年在爱丁堡大学设立了农业教席。^{[4](108)}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和普及农作物(植物)的知识、开展农具的改良开始弥补苏格兰自然条件的不足。司各特在《密得洛西恩监狱》中对阿盖尔公爵的热烈赞赏，也包括其作为一个农学家对农业改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当时，将敞地圈起来、特别是种植树木作为农场边界的做法是一种成熟的农业文明的象征。英格兰的农业生产的天然条件相比苏格兰要好得多，作为农场边界的树篱和修剪平整的草皮通常成为文明进化的表现。苏格兰女作家苏珊·法里尔在小说《婚姻》中，就以女主人公玛丽的眼光描述了英格兰农场缀满鲜花的树篱和悠闲、体面的农夫。^{[6](442)}尽管她更喜欢高地打赤脚的农夫，也不得不承认成熟的农耕条件让英格兰乡村的春天如同诗歌般美好。“贵格”约翰·格迪斯的农场以圈地为主要特色，整齐而又蓬勃的树篱与果

园给主人公达西·拉蒂默留下的印象最深。这恰恰反映了十八世纪风行整个英格兰的以树篱和篱笆圈围耕地或牧场进行开垦和改良的浪潮。当时树篱在苏格兰并不十分流行。

苏格兰虽然早在1695年就已经实施圈地条例，也有很多人通过圈围公用地的方式宣告所有权。但采用栽种树木形成树篱作为土地边界的方法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还不常见。传统的苏格兰低地和高地农业，大部分使用石墙圈地，费时费力费钱。“迟至1750~1760年，苏格兰几乎所有耕地都还没有圈围起来：这个地方依然像过去一样的没有篱笆，而且大部分是树木俱无。甚至七十年后，没有篱笆也没有围墙的天地还是很普通的”。^{[7](41-42)}

1773年，塞缪尔·约翰逊在鲍斯威尔的陪伴下到苏格兰西部的岛屿旅行时，他对苏格兰呈现出的触目惊心的光秃秃的状态感到非常震惊。他不无挖苦地说，土地之间要么没有可见的边界，要么只有松散的石墙，整个国家惊人一致地赤裸裸、光秃秃。在苏格兰见到一棵树就像在威尼斯见到一匹马那样罕见。他认为撒种子并不费事，保护树木成长也非难事。然而在这里，“既无林木充当栅栏，又无荆棘充作篱笆”，真是令人费解。^{[8](39-40)}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小说中的约翰·格迪斯于荒原的包围之中，在祖先的产业上开辟了一块鲜花盛开、果实累累的“伊甸园”。达西离开“索尔维湖地主”时，亲眼见证了一片苍凉、荒芜的峡谷和低矮的农舍与棚屋区及散乱各处的破败的渔网、渔船和渔具。当他穿过峡谷来到格迪斯的“蒙特沙龙”，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更加开化的、与世隔绝的世界，在可耕种的和适合放牧的土地上如此宜人地布满了小树林(果园)和树篱”。^{[3](70)}这些“精心修整过的草皮，整修过的小径、荒野和奇特的树木及灌木丛”都是爱好园艺、勤劳务实的格迪斯的劳动成果。这种鲜明的对比，已经暗喻了詹姆士党的复辟活动必然失败的命运。

然而，外部的景观不是最重要的。农业改革的成果不能仅从外观上来判断，否则就变成了华而不实的试验，与没有实践经验、也不考虑设得兰岛恶劣地理条件的空想家崔普托尔马斯(《海盗》)无异。司各特详细记录了格迪斯在农业改革方面的理念和实践。用雷切尔的话说，他采用最新、最流行的样式对土地实行改良，既得到了善意的称赞，也备受某些人的指责和讽刺，认为“改变我们祖先的习俗是愚蠢的行为”。^{[3](83)}但是，格迪斯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他在农场四周种植的树木集中在北部和西北部，既可以当树篱，也有抵挡北方风沙的防风林的作用。同时，为了

便于灌溉,这里水利设施完善,还形成了温室、良田、牧场等生产多种产品的田地。农业改革也不仅仅体现在对土地的多功能利用上。由格迪斯的妹妹雷切尔精心管理的养殖场,圈养着各种常见和珍稀的物种,采用的也是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尽可能地让这些家畜、家禽在“生前”过得舒适。^{[3](78)}格迪斯作为一个商人,强调产出,也就是强调生产力最终转换为商品和利润并变成再次投入生产环节的资本。他对达西说,如果我是农场主,就会把羊送到市场上去卖(而不是吃掉它)。^{[3](65)}因此,将渔猎视为休闲娱乐的“运动”方式,是他极为不耻的。在索尔维河口设立捕鱼站,只需一个看守人就可以每天捕捞大量鲑鱼;圈养家禽、家畜既节省人力又节约资源,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高尔特在小说《教区纪事》也不无深意地指出了1765年~1766年埃尔德郡的小镇上开展农业改良运动的重要意义。吉伯克先生在一片争议声中于农场四周栽种了一圈枫树林,此后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使向来光秃秃的苏格兰山地有了异域风情。^{[9](36)}从外地来到小镇承包布莱德兰庄园经营农场的库尔特先生,大量栽种果树,采用轮耕制等新式耕作方法,农场丰富的产出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从而使教区的“农耕的热情”盖过了“走私的风头”。^{[9](39)}这些人的努力,与约翰·格迪斯有异曲同工之妙,农业发展的蓬勃生机隐喻着苏格兰的希望。

三、暴徒与英雄

然而,这种有可能改变苏格兰未来的农业发展模式却以格迪斯的捕捞站被摧毁和庄园受到攻击告终。暴徒就是“索尔维湖地主”及其手下的渔夫和走私贩们。他们将格迪斯称为“精于算计的老恶棍”,鄙视他的商业化的行为,“如果你和他有买卖的交易,那么他在你面前完全是一只温顺的绵羊”,认为所谓的“贵格贸易”就是“算计和欺骗”。^{[3](62,133)}然而,这种判断在达西看来完全相反。通过他的日记,我们看到的格迪斯兄妹秉承“诚实”为上策的原则,格迪斯本人正直、坦率、善良而不乏勇气。这种截然相反的判断是如何得出的呢?假设这些人纯然地超脱于贸易之上,与商业没有任何关联的话,他们憎恨商人也不无道理。然而,这些渔夫,“大部分人都参与在这个地方和英格兰海岸之间的违法的贸易;而且他们都极其熟悉各种谎言和欺骗”。^{[3](81)}他们抵触正常的商业往来,却大肆走私商品。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走私为例,说明开放的贸易政策的必要性不同,司各特在这里表现的

政治因素更强。走私者和詹姆士党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与法国的联系,影响了苏格兰的稳定和不列颠的整体性。^{[10](760)}

在苏格兰试图开拓对外殖民的希望落空之后,政府为免于破产被迫于1707年与英格兰联盟,成为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得以分享帝国的商业利益。然而在苏格兰民间,人们认为联合只是上层为了金钱利益出卖了国家。他们对英格兰仍然有明显的抵制态度,特别当英格兰的大宗廉价商品进入苏格兰之后,对小农经济、手工业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就像一位女裁缝抱怨的,“我们的大人先生们再也不让苏格兰的针在衬衫上打褶子、在领带上缝花边了”。^{[11](39)}出于对英格兰的偏见,联合之后,一部分苏格兰商人仍然倾向于与法国等大陆国家保持贸易往来,而不愿与英格兰商人建立贸易联系。格迪斯由于家族关系,与英格兰方面多有往来,尽管退出多数商业股份,却仍然保留了在英格兰“潮网渔业公司”的股份。因此,边境地区的“渔夫们”索尔维湖渔夫们所否定的,与其说是格迪斯本人,不如说否定的是以他为代表的新兴的商业体系及与英格兰的合作。他们拒绝将鱼类变成商品,反对圈养飞禽、否定利润,实际上否定的是现代工商业经济。老式贵族雷德冈利托从封建地主的立场指出商人为谋求利润不择手段的贪婪本性,“约书亚是那种靠长时间的祷告就能让自己占有寡妇的房产的人——他很快就能收回损失。只要他遭点灾祸,他和其他的算计者就会把那当作欠上帝的一笔债,就算去诈骗也不会良心不安,直到债务抵消、实现收支平衡,或者让自己变成获利的一方”。^{[3](248)}地方治安法官对这件事睁只眼闭只眼的漠然态度一方面出于对旧王朝及已经无法再兴风作浪的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有弥漫于整个乡间的抵制英格兰的本能反应。然而,司各特在塑造约书亚·格迪斯时,并没有抹黑商人的形象。他非但并不贪婪、算计和吝啬,反而善良可亲、仁慈大方,过着真正意义上的简朴而舒适的生活。

从作品的叙事结构来看,格迪斯的捕捞站和庄园的被毁,只是詹姆士二世党人为绑架达西产生的副产品。然而,格迪斯的形象具有比其所占篇幅更重要的意义。伊安·邓肯认为,在司各特的叙事中商业企业的发展被置于浪漫主义的危险之中,而商人则被树立为适合现代社会的英雄。^{[12](105)}格迪斯之所以具有了英雄的特征,不但包括了他英勇无畏,打算用“理智”战胜武器,赤手空拳面对几百人;还因为他在达西被“绑架”之后,可以毅然放弃生意与精心照管的园林,遍寻绑架达西的“走私者”的踪迹,无私地努力“拯救”达西。“理智”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武器,这种淡定和自觉采用

“法律的和平和理智的武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态度，是对抗传统暴力的现代方式。司各特的传记作者埃德加·强森指出，约书亚的“善意与和平主义，他的非暴力和非极端主义，使他成为在农夫、渔夫和类似雷德冈利托地主那样狂热分子企图采用欺诈和暴力的世界里保持着理性的声音”，也因此“不仅使自己几乎成为达西精神上的父亲，他自己在很多方面也成为小说中主流价值观的代言人”。^{[13](923)}

格迪斯的形象，更因为其教友派的身份而别具一格。司各特曾多次在作品中回顾和再现历史上苏格兰的清教运动，批评了宗教狂热与武力冲突对苏格兰稳定的影响。但是，詹姆斯·霍格和约翰·高尔特指责司各特的叙事角度，认为他毁灭性地对待清教历史和民族精神。为此，高尔特 1823 年出版的《瑞根·吉尔海兹》(又名《盟约者》)挑战对象就是司各特的《清教徒》。司各特的《雷德冈利托》在应对这一挑战时，重申了其历史小说的怀疑主义态度和美学的立场。^{[12](249)}历史并非连续的、完整的铁板一块，而由破碎的、断裂的点经由个人和家族历史的回忆连缀而成。多重叙述的不确定性使得历史呈现出多重面貌，但最终面对的是现实。

在这部作品中，格迪斯的家族史是最早被回忆和复述的历史。从混乱的暴力到宗教信仰的选择及其随之而来的迫害，进而到联姻之后带来的富足和稳定的生活，与以达西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詹姆士党的分离主义面对政治和经济现实时的无力相比，更突显了汉诺威王朝及其治下的工业文明所代表的现代性的未来。

教友派诞生之初，由于不受圣餐、不参加宗教聚会等极端行为，除了受到英国政府迫害之外，还曾遭到来自卡梅隆派等新教派别的歧视与迫害。直到 1689 年《宽容法案》的颁布，才使他们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因此，司各特将格迪斯的身份安排成一位教友派商人具有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教友派商人在当时是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而教友派“和平、非暴力、勤勉、节俭”等信条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马克斯·韦伯在其重要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以德国的再洗礼派和英国的教友派为例，大量引用教友派辩护者巴克莱的作品，来论证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得益于清教的“禁欲”和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感谢神的恩宠以使个人在道德上无可非议的心情，浸透于清教市民阶层的整个生活氛围里，并且塑成了资本主义英雄时代的代表人物发展出特有的、形式主义严正且坚韧的性格。”^{[14](165)}因此，格迪斯本身所具有的绝非“贪婪”、“吝啬”和“算计”的特征，而是“恬静、清醒、极

为诉求良心的性格。”^{[14](141)}格迪斯被小本杰故意戏弄时，仍然担心他的安危，怕他被暴涨的溪流冲走，因为小本杰是“寡妇的独生子”。他面对几百个携带武器的“暴徒”，却毅然地将猎枪投入水中，决心以“理智”对抗暴力。这种对格迪斯的非暴力“武器”的描写，用邓肯的话说显得有些“夸张地理想化”。但是，这非常符合教友派宣扬的和平、非暴力的原则。同时，十八世纪后期，苏格兰偏僻的边区尚存以索尔维湖地主为首的封建庄园制经济与现代政治经济体制相对立的“非法”存在，也是司各特制造故事冲突的重要手段。这种戏剧性的、以绝对的封建领主制和绝对的现代性并存的极端对立方式，可以更鲜明地突出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向。旧势力的代表爱德华王子和老雷德冈利托与家乡永别，重新投入法国的怀抱。格迪斯虽损失惨重，却“很快就能恢复”。^{[3](248)}因为他背后不仅有英格兰潮网渔业公司，更有整个工商业文明做后盾，局部的破坏并不能真正动摇经济发展的基础。

四、结论

经济的发展需要和平与稳定的环境，长期饱受战乱之苦的苏格兰更加迫切地需要和平。索尔维湖区渔夫和走私者们与流亡海外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关系以及可能产生的暴乱，极大地影响到苏格兰的稳定和不列颠帝国的整体性，进而威胁到了联合为苏格兰带来的文化与经济方面的进步成果。

格迪斯自信地说，真正的懦弱是采用暴力。^{[3](61)}和平与理智是文明社会最重要的武器。格迪斯家族从富裕到贫困、从贫困到富裕的过程，完整地呈现出苏格兰的历史轮廓。格迪斯的理想和理想的格迪斯代表了苏格兰的发展方向，证明了联合是使苏格兰尽快摆脱贫困和战乱的要素，而其代表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精神”也是苏格兰繁荣富足的必要保障。

参考文献：

- [1] 亚当·斯密. 国富论[M]. 谢祖钧, 等译. 长沙: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3.
- [2] Sutherland, John. The Life of Walter Scott: A Critical Biography [M].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7.
- [3] Scott, Walter. Redgauntlet [M]. New York: Quil Pen Classics, 2008.
- [4] Broadie, Alexander.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 [5] 马尔萨斯. 人口论 [M]. 郭大力,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6] Ferrier, Susan. Marri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7] 克拉潘. 现代英国经济史[M]. 姚曾虞,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8] Johnson, Samuel & Boswell, James. A Journey to the Western Islands of Scotland and the Journal of a Tour to the Hebrides [M].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984.
- [9] Galt, John. Annals of the Parish [M]. Rockville Maryland: Serenity Publishers, 2009.
- [10] Celikkol, Ayse. Free Trade and Disloyal Smugglers in Scott's Guy Mannering and Redgauntlet [J]. ELH, 2007, 74(4): 759-782.
- [11] 司各特. 密得洛西恩监狱[M]. 王楫, 任大雄,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0.
- [12] Duncan, Ian. Scott's Shadow: The Novel in Romantic Edinburgh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3] Johnson, Edgar. Sir Walter Scott: The Great Unknown [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0.
- [14] 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康乐, 简惠美,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Spears and Stake-nets in Scott's *Redgauntlet*

SHI Meif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Redgauntlet* as the last Waverley novel which concentrates on the Jacobites is a lament to the old social order before the Union. The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is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progress declared the domination of a modern society. Joshua Geddes, not the laird of Solway Lake, is the real hero in his business and agricultural reform which is a promise to the prosperous future of Scotland. The role of symbolic primitive life of Loch Lomond and Loch Solway becomes relics of historical memory together with the forever receding of the Jacobites.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represented by Geddes would bring a bright future to Scotland.

Key Words: Walters Scott; *Redgauntlet*; the Union; Spirit of Capitalism

[编辑: 胡兴华]